


王仲鏞 主編

韩愈诗文

名篇欣赏



巴蜀書社

王仲鏞 主编

韩愈诗文

名篇欣赏

巴蜀書社

责任编辑：罗 红
封面设计：任兆祥

韩愈诗文名篇欣赏

王仲镛 主编

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(成都盐道街三号 邮编 610012)
总编室电话 (028) 6656816 发行科电话 (028) 6662019
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福利东方彩印厂印刷
成都神仙树南郊村工业小区 (028) 5183822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4.375 字数 320 千
1999 年 9 月第一版 1999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1—1500 册

ISBN7-80523-998-3/I·420 定价：24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

前 言

韩愈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作家，千百年来，誉之者固多，毁之者亦复不少。今天，我们要重新评价其人及其文学成就，必须实事求是，具体分析，任何简单轻率的肯定或否定都是不恰当的。

下面，我们略谈一些粗浅的看法。

首先，还是从韩愈其人谈起。

他生长在唐王朝经“安史之乱”后走向衰落而力图“中兴”的时期，他的父（仲卿）、兄（韩会）和叔父（云卿）都有文名，官虽不高，却有政治才能，李白替他父亲写了《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》，称赞他作武昌令时的治绩；《碑》文中还提到他叔父“云卿，文章冠世，拜监察御史，时人号为子房”。长兄韩会，史书上说他“以王佐自许”，与崔造、卢东美、张正则“时人谓之‘四夔’”，比之为唐、虞时贤臣（见《通鉴》卷二三二《唐纪》贞元元年）。其中韩会尤其值得注意，宋人王铎《韩会传》说他“与其叔云卿俱为萧（颖士）、李（华）爱奖”，“首与梁肃变体为

古文章，为《文衡》一篇”，其中说：“故文之大者，统三才，理万物；其次，叙损益，助教化；其次，陈善恶，备劝戒。始伏羲，尽孔门，从斯道矣。”又说：“学者知文章之在道德五常，知文章之作以君臣父子，简而不华，婉而无为，夫如是则至人之情，可思而渐也。”（《全唐文纪事》卷三九引）韩愈三岁丧父，即受鞠育于长兄。他一生从事振兴儒道，提倡古文，主张“文以明道”，和自幼以来所受的家庭教育是分不开的。

另一方面，他在成年以前，屡经世难，七岁时，由旧家河阳，随兄迁居长安。代宗大历十二年（777），元载被诛，韩会以“载党”由起居舍人贬为韶州刺史。唐代贬远恶州县，为罚甚重，所以他去岭南，不到一年就病死了。韩愈当时才十岁左右，既随兄南迁，这时又随寡嫂郑氏，护丧归葬河阳。后来他追述这时的情况：一家人“零丁孤苦”（《祭十二郎文》），“泣血号天”（《祭郑夫人文》），的确是十分艰难痛苦的。可是，不久，家乡又发生了战乱。“既克返葬，遭时艰难，百口偕行，避地江渍”（同上）。这次战乱，起于河朔诸镇，波及全国，有五个节度使称王，其后又有二人称帝，逼得唐德宗逃出京师长安，奔向奉天（今陕西乾县），以后再奔梁州兴元（今陕西汉中）。这场战乱，先后闹了三年多才勉强平定下来。河朔诸镇却依然盘踞故地，为朝廷隐患。其间，韩愈又随嫂“避地江渍”，移居宣城（今安徽宣城）。这些经历，在他少年时期的心目中，自然会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。

韩愈的父亲“仲卿与李白杜甫游”（见王铎《韩会传》），杜甫死时韩愈年已三岁。杜甫屡试不第，旅食京华，蹭蹬十年，韩愈则自贞元元年十九岁从宣城赴长安应试，“四举于礼部乃一得，三选于吏部卒无成”（《上宰相书》），几乎也是蹭蹬十年。虽然贞元八年（792）得中进士，却迟迟不得一官半职。后来他在《与

李翱书》中说：“仆在京城八九年，无所取资，日求于人以度日月，当时行之不觉也。今而思之，如痛定之人，思当痛之时，不知何能自处也。”这和杜甫的“朝扣富儿门，暮随肥马尘，残杯与冷炙，到处潜悲辛”亦几无二致。及至“三上宰相书，不报”，愤而离京。贞元十二年（796）二十九岁时，不得不投身节镇，充当幕僚。先后任汴州、徐州观察推官，而两处在他刚一离开的时候，就发生兵变，汴洲乱时，他的家属还在危城之中。以上这些现实社会生活的体验，对他后来的思想意识，实际上起着更为巨大的作用。

直到贞元十八年（802）三十五岁时，韩愈才算真正踏上了仕途。自此至长庆四年（824）五十七岁逝世，大略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。

从德宗贞元十八年（802）到宪宗元和十一年（816）为前一阶段。这一阶段，是他浮沉下僚，政治上少有成就，而在文学上则收获最大、建树最多的时期。他始任国子监四门博士约年余，贞元十九年（803）夏，擢拜监察御史。当时柳宗元、刘禹锡、张署、李方叔同任此官。韩愈数年前曾作《争臣论》，很重视谏官的职责，于是，与张、李同时上疏论事，结果，德宗大怒，被贬为阳山县令（今广东阳山）。这次被贬的原因，历来有三种说法，新、旧《唐书·韩愈传》都说是由于上疏论宫市，而皇甫湜《韩文公神道碑》则说是因为“关中旱饥”，“请宽缙民徭，而免田租之敝，专政者恶之”，所以遭贬。今《韩集》中有《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》，与此说合。然宋人洪兴祖《韩子年谱》据《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、李十一拾遗、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》、《岳阳楼别窦司直》及《永贞行》诸诗，以为是由于政见不同，为二王、刘、柳所排。衡诸“永贞革新”中韩愈所持的

保守态度，刘、柳虽属文学上的至交，思想议论实多有牴牾，这种推断也不是没有根据的。如果把这三个方面综合起来看，则韩愈在当时政治斗争中的双重表现，或许可以得到较为合理的解释。

在阳山一年，饱经道途险艰和贬所穷僻之苦，他也还爱护人民，“政有惠于下，及公去，百姓多以公之姓以名其子”（李翱《韩文公行状》）。贞元二十一年（805）正月，德宗死，顺宗即位，大赦，夏秋之际，到郴州待新命。直至九月，方离郴州赴江陵（今湖北江陵），任法曹参军。宪宗元和元年（806）六月，自江陵召拜国子博士，次年夏，分教东都，“权知三年，改真博士”（《行状》）。这次任教的时间是比较久的，至元和三年六月，始改都官员外郎，守东都省，仍在洛阳。不久，又改河南令，年余。六年（811）秋，至长安，任职方员外郎。七年（812）二月，因上疏为华阴令柳涧辩诬，贬，复为国子博士。八年（814）三月，迁比部郎中，兼史馆修撰。这时，他因屡遭挫折，牢骚满腹，相继写了《送穷文》、《进学解》诸文，对于新职并不感兴趣，“入馆不修史，或贻书劝其笔削，愈答书以谓：‘自古为史者，没有人责，则有天灾。’柳宗元闻而非之，以书箴其失”（见宋程俱《韩文公历官记》，韩愈语见《答刘秀才论史书》；柳宗元《与韩愈论史官书》载《柳河东集》）。九年（814）十月，转考功郎中，十二月，又以考功知制诰。他渐渐靠近了皇帝的身边。

直接促成韩愈在仕途转化的是讨淮西之役。地处淮西的彰义军节度使吴少阳死，其子吴元济匿丧不报，拥兵自立。元和十年（815）春，元济纵兵侵掠，直达洛阳附近。朝廷发兵进讨，师久无功。这年五月，宪宗派御史中丞裴度到军中宣慰，观察用兵形势。回来以后向宪宗说，淮西的叛军是可以讨平的。当时，韩愈

也奏上《论淮西事宜状》，以为“淮西三小州，残弊困剧之余，而当天下之全力，其破败可立而待。然所未可知者，在陛下断与不断耳。”同时还条陈用兵利害，以赞助裴度的意见。可是，却与宰相李逢吉、韦贯之所论不合。因而，立即被降职为太子右庶子。此后，淮西的战事仍然在进行。到了元和十二年（817）七月，宪宗终于下了最大决心，以裴度为宰相兼彰义节度使，亲往前线督战，韩愈得裴度表荐，任彰义军行军司马，参加了讨淮西的战役。十月，李愬入蔡州，生擒吴元济。淮蔡平定，年底回京，韩愈以功进封为刑部侍郎。从此，他已跻身于朝廷要职，为宪宗所谓的“中兴”之业，做出了贡献。

这里，顺便谈谈韩愈热心功名利禄的问题。就在最近一两年间，韩愈先后写了《示儿》、《符读书城南》两首诗，大概是由于经过长期奋斗，历尽艰险曲折，最近才取得高官厚禄之故吧？他用“学而优则仕”的道理来教导十多岁的儿子，真讲得绘声绘色，淋漓尽致。以至招来了众多后人的非议，至今论者还用以作为判定他品格卑下的口实。这自然是他不足为训，应当受到指责的一方面。不过，不能“以一眚掩大德”。衡量一个人的品德高下，主要是应当以他的全人作为依据的。宋人最早一个议论《示儿》诗的是苏轼，他举其中诗句和杜甫的《示宗武》对比，以为韩诗“所示皆利禄事也”；而杜诗则“所示皆圣贤事也”（《苕溪渔隐丛话》前集卷一六引）。这样就诗论诗，未尝不可，他却并不曾以此判定韩、杜品格之高下，他是古今来最为全面肯定韩愈之一人。近代学者程学恂说：“教幼子止用浅说，即古人肄雅加冠（《礼记·学记》：“宵雅肄三，官其始也”），亦不过期以服官尊贵而已，何尝如熙宁、元丰诸儒必开以性命之学，始为善教哉？此只作一通家常话看，而自有以见其为公处。”（《韩诗臆说》）

“求利禄行道于此世”（《答陈商书》），把“求利禄”和“行道”联合在一起，韩愈自来的看法，就是如此。而唐代士人风习，也是如此；中国封建时代所有的知识分子，亦莫不如此。只是说与不说，巧说或直说，有所区分而已。宋人黄震论《符读书城南》诗说：“亦人情诱小儿读书之常，愈于后世之伪饰者。”（《黄氏日钞》）韩愈之外，李、杜、元、白诸集中，都保留了一小部分钦慕利禄以及干乞告哀之作，我们大体也可以与这类诗同样看待吧。

韩愈任刑部侍郎半年多，转兵部侍郎。这年，他费了很大功夫，写成《平淮西碑》，文中高度赞扬了裴度定策平叛之功。可是，却为骄兵悍将所不满，宪宗不得不诏令仆碑，由段文昌另作。后来李商隐有《韩碑》诗咏其事。苏轼记有人题临江驿壁上诗云：“淮西功业冠吾唐，吏部文章日月光。千载断碑人脍炙，不知世有段文昌。”（《东坡志林》）碑文规摹《尚书》、《诗经》，所谓“点窜《尧典》《舜典》字，涂改《清庙》《生民》诗”（李商隐《韩碑》），典重高古，而不掩雄奇酣恣之气，是韩愈的代表作之一。元和十四年（819）正月，宪宗从凤翔法门寺迎佛骨入宫中供奉三日，引得京城士庶奔走施舍，破财废业，有的人甚至烧顶灼臂，卷起了一阵疯狂佞佛的热潮。韩愈早年即崇奉儒学，近数年来，又相继写了《原道》等文，觝排异端，攘斥佛老，以维持中华文化传统为己任，并以继承“道统”自命。这时，他眼见佞佛之风对于社会所造成的严重危害，更出于卫道的激情，于是不顾利害，毅然挺身而出，奏上了震动一时的《论佛骨表》。历论前朝诸帝“事佛求福，反更得祸”；又举出“诸侯用夷礼则夷狄之”的《春秋》大义，把矛头直指宪宗，以为“佛本夷狄之人”，佛骨乃“朽秽之物”，“乞以此骨付之有司，投诸水火，永

绝根本，断天下之疑，绝后代之惑”。气盛言直，宪宗得表大怒，欲加死罪，幸有裴度、崔群等人力救，终于远贬为潮州（今广东潮州）刺史，并饬即日上路。他仓卒出都，途中备极凄苦，我们今天从他《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》和途中纪行诸诗，还可见一斑。到任以后，他写了《潮州刺史谢上表》，文中再三表明，“臣以狂妄戇愚，不识礼度，……言虽可罪，心实无他。”又说：“臣少多病，年才五十，发白齿落，理不久长，加以罪犯至重，所处又极远恶，忧惶惭悸，死亡无日，单力一身，别无亲党，居蛮夷之地，与魑魅为群，苟非陛下哀而念之，谁肯为臣言者。”接着，便大颂宪宗“中兴”之业，以为功过高祖、太宗，劝其“东巡泰山，奏功皇天”，而他则愿在此“千载一时不可逢之嘉会”，“奏薄技于从官之内”，为文以“论述陛下功德”云云。末了，还说自己“怀痛穷天，死不闭目，瞻望宸极，魂神飞去。伏惟皇帝陛下，天地父母，哀而怜之，无任感恩恋阙，惭惶恳迫之至！”这一表文，悔罪深切，措辞哀苦，真正感动了宪宗，对宰相说，韩愈“大是爱我”，因此，打算再度重用他。由于宰相皇甫镈向来不喜欢韩愈，从中阻遏，仅得量移袁州（今江西宜春）刺史。在潮州任上，只有六个多月。他的《潮州刺史谢上表》，和先前的《论佛骨表》，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。所以，就连最推崇他的欧阳修也说：“每见前世有名人，当论事时，感激不避诛死，真若知义者；及到贬所，则感戚怨嗟，形于文字，其心欢戚，无异庸人。虽韩文公不免此累。”（《与尹师鲁第一书》）这也是他性格中所表现出来的软弱一面，不必为之辩解的。

元和十五年（820）正月，宪宗为宦官陈弘志等所杀，扬言服金丹药发致死。穆宗即位，改元长庆。这年九月，穆宗召韩愈为朝散大夫、国子祭酒。这是国子监的最高官职，品级在原先兵

部侍郎之上，不过学官总是没有多少实权。在潮、袁二州任刺史时，尽管时间不长，他也替人民做过一些好事。如为潮州人民驱鳄，他写了有名的《祭鳄鱼文》。这件事情，新、旧《唐书·韩愈传》都有记载，说是祭后的当晚，鳄鱼“西徙六十里，自是潮无鳄鱼患”。对此，近代从胡适起，就有这样一种说法，以为它是韩愈自造的神话（见《白话文学史》第三五三页）。现在还有人说他“弄虚作假，欺世盗名”。其实，遍检《韩集》，并找不到韩愈自己说过他的文章曾使鳄鱼远徙的丝毫迹象，如果鳄鱼真个迁徙的话，那也应是“强弓毒矢”所发挥的威力。古时边远地区做地方官的，凡是对人民做过好事的人，总会对他产生一些奇异的传说，如柳宗元就做了罗池神。两《唐书》的作者，向以好采传奇小说著称，我们却不能从此便反过来硬说这一神话是由韩愈自己捏造的。不然的话，韩愈的学生李翱所写《行状》、皇甫湜所写《神道碑》，何以都只记载了他改变当地掠卖人口的陋俗一事，而于驱鳄远徙，却是只字未提？另一个学生兼女婿李汉编纂《韩集》，他把《瘞砚铭》、《毛颖传》、《送穷文》与《祭鳄鱼文》编在一起，称为《笔砚鳄鱼文》，而不收入“祭文”类中，那里面连《祭竹林神文》、《曲江祭龙文》都收了。《集序》中李汉自言“辱知最厚且亲”，他当然是习闻师训的。这就说明，韩愈自己也只把它视为俳谐之作。他写《毛颖传》，人们指责他“以文为戏”，柳宗元却有《读韩愈所著〈毛颖传〉后题》一文，大加赞扬。韩愈有《平淮西碑》，柳宗元就写了《平淮西雅》。柳有《宥蝮蛇文》、《憎王孙文》诸作，韩愈的《祭鳄鱼文》，难道不是相类似的么？从二人的桴鼓相应，便可以明白《祭鳄鱼文》的性质了。

长庆元年（821）七月，韩愈从国子祭酒又转官为兵部侍郎。

国子祭酒任期也短，今天可知的是他对过去国子监中吏部选任学官，“多循资叙，不考艺能”有所改革，规定“其新授官，上日必须考试，然后放上”（《国子监论新注学官牒》）。注意师资，认真整顿了一下学风。李翱《行状》还说：“入迁国子祭酒，有直讲能说礼而陋于容，学官多豪族子，摈之不得共食，公命吏曰：‘召直讲来，与祭酒共食。’学官由此不敢贱直讲。奏儒生为学官，日使会讲，生徒多奔走听闻，皆相喜曰：‘韩公来为祭酒，国子监不寂寞矣。’”他先后四次进入国子监，写出了《师说》、《原毁》这类文章。今天来看，他的教育思想及其实践，也是比较值得肯定的。

在兵部侍郎任上，刚一去就碰上了镇州（今河北正定一带）兵变的事件。这在李翱的《行状》和皇甫湜的《墓志铭》中都有详细的记载，《新唐书·韩愈传》亦经采入。其经过是：上年秋，成德节度使田弘正为部将王廷凑所杀，朝廷命深州刺史牛元翼讨伐，反被围，更命裴度为镇州四面行营都招讨使，统兵进讨，而师久无功，深州之围未解。长庆二年（822）二月，朝廷不得已，乃正式任命王廷凑为成德节度使，并命韩愈为宣慰使，前往宣慰，当时形势是十分严重的。为了国家统一事业，韩愈不顾生命危险，直入镇州，面折骄兵悍将，廷凑听命，得解深州之围。苏轼说他“勇夺三军之帅”（《潮州韩文公庙碑》）即指此事。他一贯反对藩镇割据，力图巩固中央王朝，这与他所信奉的《春秋》“大一统”的思想有关，更重要的是他自少小以来，屡经离乱，现实生活的感受，不断使他对于藩镇割据的祸害有所认识，力求有所改变的缘故。而他的这种思想，是适合于那个时代要求的。

镇州事定后，这年九月，韩愈由兵部转为吏部侍郎。三年（823）六月，改授京兆尹兼御史大夫，十月，复为兵部侍郎，随

即又转吏部侍郎。两三年中，屡经迁转，都不得久于其任，反映了当时朝廷中政治斗争的复杂。而自镇州事件以后，朝廷无力更制藩镇，“由是再失河朔，迄于唐亡，不能复取”（《通鉴》卷二四二《唐纪》长庆二年）。韩愈康时济世的愿望，渐渐落空了。这时，他又写了一首说家常话的诗《示爽》，其中仍然浮露出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”的庸俗意识，但在最后说，“吾老世味薄，因循致流连。强颜班行内，何实非罪愆。才短难自立，惧终莫洗湔。临分不汝诳，有路即归田。”他的利禄之念，亦已大不如前。四年（824）六月，他因病告假，归卧长安城南别业，友人张籍、贾岛等时来相伴，有《南溪始泛三首》，相传是最后所作，平淡自然，意趣颇近于陶渊明的诗了。

韩愈是长庆四年十二月二日死于长安靖安里家中的。关于他死时情况，张籍的《祭退之》诗讲得很清楚，说他当时胸怀旷达，意态安详，“赠我珍重言，傲然委衣裳。公比欲为书，遗约有修章，令我署其末，以为后世程。家人号于前，其书不果成。”他向张籍临别赠言，还要郑重书立遗嘱，由于家人号哭于前而不果，看来死时是清醒的。问题出在白居易有一首《思旧》诗，其中提到“退之服硫磺，一病迄不痊”。这就引起了后世许多纷扰。至今还有人把“服道士‘仙丹’而亡身”，作为论证韩愈虽然“辟佛，却不辟道”的证据之一。今人曾考定白诗的“退之”是指韩愈为之作墓志的卫中立（即《监察御史卫府君墓志铭》），或许未可尽信。其实，韩愈也可能服过丹，曾有《又寄周随州员外》诗云：“金丹别后知传得，乞取刀圭救病身。”那是因为“救病身”，甚至或者出于老耽声色，偶信传闻，误服所谓“灵丹妙药”，亦属人们生活中所常见，这和他反对炼丹以求长生完全是两回事。至于反对道教，既然韩愈是从破坏人伦秩序和社会经

济的角度上看问题，则它与佛教并无二致；像唐王朝那样，把老子认做本家，尊为玄元皇帝，韩愈却说他“坐井而观天”。觚排佛老，二者本一视同仁，认为都应当“人其人，火其书，庐其居”（《原道》）；在他所写的许多诗文中，像李干（《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》）、卫中立墓志铭的揭露炼丹“饵以不死”之非，《谢自然诗》、《桃源图》、《记梦》、《谁氏子》诸诗的直斥神仙之妄，《华山女》诗，极力描写女道士自炫姿容，升坛讲道，倾动世俗，其讽刺意味，更是十分明显。如果因为没有发生像谏佛骨那样大的惊人行动，就说他佛老“并举”，不过是连类而及，就不对了。

综观韩愈的一生，苏轼所说“文起八代之衰，道济天下之溺，忠犯人主之怒，勇夺三军之帅”那几句话（见《潮州韩文公庙碑》），还算概括得比较全面，只不过不能肯定得那么高罢了。四者中，一是文学上的功绩，即提倡古文以反对骈体文。所谓“衰”，是作者站在古文家的立场说的。二是思想上的贡献即兴儒学，斥佛老。三指阳山、潮州之贬，四指镇州之行，则属于政治上的表现，二者都是难能可贵的。然而成效甚微，尤其是他保守的政治态度，限制颇大。他的努力，前者并不能改变皇帝的意志，也无动于世俗的风气；后者，虽把牛元翼从深州之围中放了出来，王廷凑还是进占了深州，从此河朔一带尽归藩镇，实无救于唐王朝的日趋衰落。所以四个方面不能平列，政治上的表现远不如他在思想上和文学上所作努力的重要。

本来，韩愈自己和他的前辈一样，总是把“道”放在第一位，连六朝时刘勰写《文心雕龙》也从“宗经”、“征圣”开始。苏轼把“文”列在“道”之前，认为韩愈的成就首先是在“文”的方面。他的看法是很对的。我们看看韩愈在《进学解》中借国

子监诸生之口来评价自己的一段话很有意思：

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，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。记事者必提其要，纂言者必钩其玄。贪多务得，细大不捐，焚膏油以继晷，恒兀兀以穷年。先生之于业，可谓勤矣。

觝排异端，攘斥佛老，补苴罅漏，张皇幽眇。寻坠绪之茫茫，独旁搜而远绍。障百川而东之，回狂澜于既倒。先生之于儒，可谓劳矣。

沈浸醖郁，含英咀华，作为文章，其书满家，上规姚姒，浑浑无涯，周《诰》殷《盘》，佶屈聱牙，《春秋》谨严，《左氏》浮夸，《易》奇而法，《诗》正而葩；下逮《庄》《骚》，《太史》所录，子云相如，同工异曲。先生之于文，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。

少始知学，勇于敢为。长通于方，左右具宜。先生之于为人，可谓成矣。

也是四个方面，政治上的表现，可以包括在“为人”以内，“觝排异端，攘斥佛老”，于卫道有功，已如前述，他主要着眼于佛、道二教破坏社会经济，打乱人伦秩序的方面，理论上所破不多；“补苴罅漏，张皇幽眇”，当指他那些阐扬儒道，如“五原”一类的文章。如他的《性三品》说（《原性》），在东汉的王充、荀悦的著作中，已经提出（见《论衡·本性》、《申鉴·杂言下》）。韩愈只是把它讲得更为完整和条理化一些罢了。他的学生李翱所写《复性书》，认为“百姓之性与圣人之性弗差”，“桀纣之性，犹尧舜之性也，其所以不睹其性者，嗜欲好恶之所昏也；非性之罪也。”对《师说》有所发展，为后来宋儒的性理之学开了先路。“寻坠绪之茫茫，独旁搜而远绍”，当指建立“道统”之说。这个

问题，陈寅恪先生以为“退之道统之说表面上虽由《孟子》卒章所启发，实际上乃因禅宗教外别传之说所造成”。而这是由于他早年“从兄会谪居韶州”，其处“为新禅宗之发祥地，复值此新学说宣传极盛之时，以退之之幼年颖悟，断不能于此新禅宗学说浓厚之环境气氛中无所接受感发”之故（《论韩愈》）。他的这个看法，是不无道理的。为了反对佛教的需要，接过他们手中的武器，以相对抗，亦势有可能。不过，他的“道统”实际还只停留在口头书面上，并不曾像禅家的宗门传授一样真正建立起来。所以，连后来宋代的理学家也不承认他。韩愈在思想史上，是应当写一笔的，但他在思想史上的地位，绝不能和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相提并论。

二

其次，谈谈韩愈在文学上的成就。

主要从他所倡导的古文运动说起。所谓古文，是与当时流行的“时文”相对而言的。即主张以奇句单行为主，也并不完全排除文中的偶句；取法先秦两汉文体中朴实畅达的散文来改革六朝以来的繁辞丽藻、华而不实的骈文。这个运动，在西魏、在隋初就曾有人提倡过。唐初，由于太宗、虞世南等人的习尚，凡朝廷公府所发诏诰教令，士人贡举所试律赋策判都使用骈文，各有程式。韩愈曾以考功郎中知制诰，又迁中书舍人，今《集》中不载所草制诰，即因他写这类文章也不得不使用骈文，《集》载“表状”一类，时用偶句，亦由此故。他所要改革的乃是一般人事间所用的文字，即《集》中的杂著、书启、赠序、碑铭、哀祭“杂文”等类。在韩愈以前，陈子昂、萧颖士、李华、梁肃、元结、

独孤及诸人都做过这方面的努力。前已提到韩愈长兄韩会为萧、李所爱奖，并与梁肃同倡古文，这样的家学渊源，对于韩愈的影响，可能更大。他自称“少始知学，勇于敢为”（《进学解》）。又说：“自笑平生夸胆气，不离文字鬓毛新。”（《酬振武胡十二丈大夫》）正是由于知之深而信之笃，所以他才有过人的勇气和胆略，毅然敢当重任。“障百川而东之，回狂澜于既倒。”（《进学解》）把作文和明道结合起来，提出了一套古文运动的纲领，团结同志，招纳门徒，互相标榜，共同实践，使运动的声势壮大起来，因而能够取得前人所未有的巨大成就。

而他的古文运动纲领，也是针对社会现实，在不断实践当中提出和逐渐充实起来的。首先强调文和道的统一。他以弘扬先秦儒家的道德观念和政治思想为职志，一方面攘斥佛老，一方面反对藩镇，力图配合唐宪宗所谓的“中兴”之业，使皇权得以巩固，国家统一与社会安定得以维持。这就是道的基本内容。二者之间，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，而文亦必须重视，“文书自传道”，“辞不足不可以为文”。只有改革骈文的繁辞丽藻、华而不实的弊病，做到文从字顺、言之有物，人们容易了解、接受，才能更好地为弘扬儒道，排斥异端发挥作用。这就是他的纲领。他非常注意作者的学习和修养。《答李翱书》和《进学解》中设为太学生之口所说“先生之业”、“先生之于儒”、“先生之于文”几段话，可以比较集中地看到，他对于实行这个纲领的具体作法和要求。其他文中也反复强调。对于一个作者来说，他首先要立定志向，“无望其速成，无诱于势利”。在学习中，“养其根而俟其实，加其膏而希其光”。一步一步地提高自己，从“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，非圣人之志不敢存”到“识古书之正伪，与虽正而不至焉者，昭昭然而黑白分”的地步，即：对于古书，要鉴别正伪，取